

新權威主義的當下變種

● 蔡志棟



《中國震撼》一書的最大特點根本不是所謂「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之類的說法，而是其本質是新權威主義在當下的變種。張維為可能不承認自己是新權威主義者，因為在書中找不到「新權威主義」這種提法。但這正是此書的巧妙之處。

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以下簡稱《中國震撼》，引用只註頁碼）出版以來，的確在中國大陸震撼了一把。此書於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至當年5月已是第六次印刷了。該年上半年筆者參加多次學術會議，席間多有同行在談論這本書。有趣的是，一位在宣傳部門工作的朋友竟然破天荒地給筆者快遞了這本書，因為據說他們領導都在讀它。有一次隨

便上網，也發現筆者的一位年紀頗大、不輕易許人的老師也撰文讚賞此書。由此看來，此書基本上是好評如潮。可是，筆者自從第一次閱讀此書便有不同意見，遂作此短文求教於讀者諸君。

筆者以為，此書的最大特點根本不是所謂「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之類的說法，而是其本質是新權威主義在當下的變種。

所謂「新權威主義」，簡言之就是主張一個強勢政府，甚至是專制政府，主導經濟改革，從而用經濟騰飛這一事實所具有的力量賦予其統治以合法性。這一思潮在1990年代興起，馬上受到左右兩方面的夾攻，其後除了蕭功秦之外，幾乎不再聽見其他聲音。蕭功秦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撰述，為新權威主義辯護，前幾年還出版相關專著（蕭功秦：《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但新權威主義幾乎沒有理論上的其他同好。現在張著出版了，知識界總算有了相同的呼聲。

張維為可能不承認自己是新權威主義者，因為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找不到「新權威主義」這種提法。但這正是此書的巧妙之處。筆者認為此書本質上還是一部提倡新權威主義的著述。之所以這麼判定，因

為此書符合新權威主義的兩個核心要件：

第一，主張強勢政府，甚至反對民主。張維為認為「中國模式」具有八個特點，其中一個就是「強勢政府」（頁100），而「強勢政府」是舉全國之力實現大目標背後的支柱（頁87）。張對強勢政府的肯定是極其明確的。

張維為不僅主張強勢政府，還明確反對民主。這樣的言論在此書中俯拾皆是。比如，他認為金融海嘯起源於「民主典範」之美國，而且實行民主制度的美國居然對這場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套用森（Amartya Sen）的句式，張認為這就表明「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頁95）。

如果說這還是在一般的層面上反對民主，也許還僅僅是反對西方化的民主，那麼，針對中國的特殊情況，張在書中更是明確主張放棄「民主」這種提法。他認為，「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國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頁85）後面兩句話無疑是正確的。民主不能流於形式化，而應該追求實質性內容；但反過來，若不能追求實質性內容，是否就應該放棄民主？雖然專制之下人民也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但這種施捨的仁政和由民眾自己爭取來的幸福存在着質的區別，前者很可能由於統治者情緒的變化或利益的計較而喪失殆盡。

事實上，現在國內外學界頗流行的「第三種自由」或者說「共和主義的自由」思潮，正是應對此種將民主等同於良政的民主觀而生。自從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

提出「兩種自由說」以來，強調「消極自由」的重要性成為某種自由原教旨主義者的說辭。但是，敏銳的學人如劍橋學派的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澳洲政治哲學家佩蒂特（Philip Pettit，又譯佩迪特）等人，意識到「消極自由」內部也有區分（斯金納著，李宏圖譯：《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佩蒂特著，劉訓練譯：《共和主義：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指的是「免於干涉的自由」（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可是，在專制制度之下，帝王由於種種緣故（比如心情好）不來干涉你，那也是一種「消極自由」。毋庸置疑，這種自由隨時可能會被剝奪，主體在享受這種自由時也會膽戰心驚，害怕隨時降臨的壓迫。

在這個背景下，「第三種自由」應運而生。它也是一種「消極自由」，不過指的是「免於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明確將專制統治者按照己意隨意支配民眾的可能性完全消除。「良政」當然比「惡政」、「劣政」好，但它的一個先天不足之處，是將政治之好壞完全繫於統治者的能力和個人之喜怒哀樂。因此，這樣的良政很可能只是統治者一時心情愉快的產物，如果統治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那麼，良政就會立即消失，而代之以劣政乃至惡政。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程序相當重要，它至少表明，任何違背程序的善意都不可以施加於民眾，更遑論是惡意了。

第二，以經濟之飛速發展為政治之合法性作辯護。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騰飛，書中列舉了大量數

《中國震撼》本質上還是一部提倡新權威主義的著述，因為此書符合新權威主義的兩個核心要件：第一，主張強勢政府，甚至反對民主。第二，以經濟之飛速發展為政治之合法性作辯護。

《中國震撼》的新穎之處在於，它不是對新權威主義的赤裸裸宣講，而是對之作出某種巧妙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以「文明型國家」的提法為核心，以作者豐富的國際性閱歷為佐料的。

據來說明這一點。值得稱道的是，張維為有意識地提及了中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例如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內陸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張甚至明確表明，「中國的面積大，人口多，情況複雜，用全國平均數統計往往就面臨這種尷尬。這很像天氣預報……如果你預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平均氣溫為32攝氏度，那恐怕只有氣象統計學上的意義了。」(頁33)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張維為是在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他之所以提及這一點，只是以退為進，為其提出「1+1大於2」的思路作鋪墊。他早已意識到，如果一味強調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那麼，必然有人會舉出經濟不發達地區來作反駁。為了應對這種可能的反駁，他提出了「1+1大於2」的思路。其基本含義是，沿海發達地區是發達板塊，相當於發動機；內陸不發達板塊的確存在，但其不是負擔，而是發動機的後援。用張的話說就是：

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型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超大型的「新興經濟體」的板塊。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點是現代經濟、現代管理、現代研發、現代服務業，那麼後者的主要特點就是巨大的規模效應和成本效應，兩者的結合某種意義上就是質和量的結合。這種結合便產生1+1大於2的中國效應。(頁49)

這種觀點輕易地消解了理論對手對「經濟騰飛」的質疑。

以上說明，《中國震撼》的實質是倡導新權威主義。但是，此書的新穎之處在於，它不是對新權威主

義的赤裸裸宣講，而是對之作出某種巧妙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以「文明型國家」的提法為核心，以作者豐富的國際性閱歷為佐料的。

本書最獨特的地方是提出了「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張維為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他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但同時，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之與眾不同。「文明型國家」是將「文明」和「國家」結合成一個有機體。它和「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不同，後者中的「文明」和「國家」是一對矛盾體(頁64)；它也和「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同，民族國家的動力是民族主義，其惡性發展是現代無數戰爭的根源(頁60)。然而，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卻以「和」為最大的追求，因此不主張衝突。總體來說，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中國主要有八個特徵：(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4)超深厚的文化積澱；(5)獨特的語言；(6)獨特的政治；(7)獨特的社會；(8)獨特的經濟(頁63-79)。

顯然，「文明型國家」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令人欣喜的中國化話語，是一種對中國進行分析時不再採用「民族國家」這種西方話語的努力。這一點值得肯定。時下很多對《中國震撼》一書的肯定也是從這個角度立論的。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在筆者看來，本質上，這是隱性反民主的「中國特殊論」的另外一種表達。

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兩

者有時是一回事，本質上都涉及現代國家的認同問題。一般而言，民族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些形式有時也是並列的。按照民族主義理論大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觀點，民族主義有三種形式：種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政治民族主義(或稱公民民族主義)(參見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顧名思義，種族主義以種族作為認同的象徵；文化民族主義以文化因素作為認同的象徵；政治民族主義則以現代政治規範，比如民主、自由、正義，作為認同的符號。換言之，無論你的種族是甚麼，傾向於甚麼文化，只要你認同現代政治規範，你就是某個國家的成員。現代民族國家也因此得以組建、凝聚。

可見，現代國家之所以為現代國家，其核心認同標誌不再是種族，也不必是文化傳統(雖然這些也是認同的重要因素)，而是現代政治規範。從這個角度看，一個質疑民主的現代國家是否還是一個現代國家，這一點是一個巨大的疑問。也正是源於這點，無論張維為如何質疑民主，提倡良政，甚至暗含以良政代替民主、重新詮釋民主之意，這種行為只能是個人行為，不可能上升為國家行為。

進一步，在筆者看來，從某種角度看，「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與其說是揚棄「民族國家」範疇的一種努力，不如說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又一次含蓄的爆發。本書的意圖就在於以一種新的提法凝聚國人之心得，再次在國際上確立中國自身與眾不同的形象，其效果和明確

以民族主義立命如出一轍。別的尚不說，學界對這種提法的沾沾自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因為通過「文明型國家」這個範疇，我們不僅找到了認同符號，而且找到了特立獨行的認同符號。而民族主義的一個要件就在於對外突顯自身與其他民族的不同。

但是，這種新型民族主義的概念潛含着某種危險。前面說過，現代民族主義是以現代政治規範作為認同象徵。但「文明型國家」這種新型提法卻將消解、乃至否定部分現代政治規範作為內在基礎，並以這種消解、否定當做確立自身獨特身份的合法性途徑。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而自豪之際，我們追求「政治文明」這一目標很可能會落空。這是需要我們高度警惕的。

這種危險性由於張維為本人閱歷的特殊性而更加突顯。他周遊列國，見多識廣，具有國際視野，行文中常常伴以國際性的比較。這種做法一方面有益於擴展我們的眼界，另一方面，恕筆者直言，又增加了若干迷惑性。因為對於大多數沒有出過國、或即便有出國經驗，但所到國家不及作者多的國人來說，辯論的話語權似乎不夠強大。但是，思想者的洞見恐怕和遊歷之多寡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

當然，《中國震撼》一書提出的很多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比如，作者在討論人權問題的時候，所提出的一個觀點值得高度讚賞。他認為，解決民生問題，最起碼是吃飯問題，是人權最基本的要求和表現(頁161-62、180)。這點恐怕連自由主義者也要承認。因為無論你把自由權放到甚麼地位，生命權

「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又一次含蓄的爆發。本書的意圖就在於以一種新的提法凝聚國人之心得，再次在國際上確立中國自身與眾不同的形象，其效果和明確以民族主義立命如出一轍。

還是最基本的權利，而吃飯是維持生命的基本動作。還比如，作者提出相對於民主的程序，更要講究民主的實質，提出了「良政」的觀念（頁134）。這種觀點是有意義的。只

是作者矯枉過正，流露出了較多輕視民主程序的意思，令人不敢苟同。然而，這些並不妨礙此書本質上仍是新權威主義在當下的巧妙變種，對此筆者不得不再次加以強調。

改造與控制

● 張慧卿



魏斐德的《紅星照耀上海城》以上海的社會管理為研究對象，與他的《上海警察》、《上海歹土》合稱為「上海警察三部曲」，敘述了上海警察從1927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

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 (1942-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 (1942-1952)》(以下簡稱《紅星照耀上海城》，引用只註頁碼) 是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教授的遺著，其中譯

本由魏教授的遺孀梁禾女士親自操刀，201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以上海的社會管理為研究對象，與魏的《上海警察 (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英文原著為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歹土——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 (1937-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英文原著為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兩書合稱為「上海警察三部曲」，敘述了上海警察從1927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

《紅星照耀上海城》一書論及了1942年以後，特別是1945年以後，共產黨如何通過在國民政府警察內部進行活動，建立秘密支部，最後將國民黨領導的上海警察機構變成由共產黨領導的公安局。書中細緻地描述了1949年以後至1952年上海社會管理的歷史，包括共產黨對城市的接管、控制流氓與輕罪犯、改造妓女和舞女、戒除鴉片毒癮、鎮壓武裝犯罪、打擊外國媒體、救濟難民與遣送回鄉、鎮壓反革命、「三反」與「五反」運動等內容。作者